

孩子们都很渴望被认同,期待在每天或每周的总结会上上台分析,所以就按要求积极的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又使学生个人领导力得到了锻炼。

3. 自选同桌,让进步有“力”可助

在班级日常管理中,班主任大多会以高矮个、男女生搭配进行座位安排,开学一段时间后就会根据学科老师反馈和自己的判断调换座位,每次都要绞尽脑汁、权衡利弊,尤其是有的孩子你无论放在哪里,他还是你心中的c位,不仅达不到效果,还会带动一片人。

我会让孩子们自选同桌。我认为,同桌是接触最频繁的伙伴,从我多年的观察研究,时间长了,同桌的行为表现、处事方式甚至说话语气都会惊人的相似。因此,同桌选择是进行同伴教育的绝佳时机。先有一个考虑期,让他们自己私下协商寻找小伙伴,在双方认同的基础上,填写“同桌申请书”和“小组成员申请书”。“同桌申请书”第一条要说明你选择“他”作为同桌的原因,第二条制定成为同桌后的共同成长小目标。第三条签下承诺书,主要内容是相互帮助、彼此督促、共同进步,发生矛盾的处理方法,以及达不到要求后的班级服务内容;在同桌申请之前,班主任要考虑到同学们的身高以及男女生的搭配要求,当第一阶段同桌稳固之后,可以在两个月后进入第二阶段的应用,选择新的同桌。

学生选同桌的过程,也是彼此被认同的过程。让学生自己选同桌,一方面可以激励他们积极向上的自主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同桌的助力下,让进步更有氛围。学生成长,究其本质是自我成长。每个学生选择同桌的同时,也是被别人选择的过程,在实践中,就有一对二和一对三的情况发生,也有前一天形成合作,第二天又临时变卦选择新的同桌,这种变化也是学生学习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一课。自选同桌过程中的双向选择和认可,是孩子们在同伴间进行价值建构的一种形式,实践证明,这种积极的价值建构有助于激发学生的自主能动性。

二、情景模拟,在思辨中成长

1. 前置性情景模拟

班主任在班级创设一种背景,由学生模拟某一问题事件当中的某一角色进行演

练,调动学生学习参与的一种互动方式。情景模拟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首要前提就是学生参与创设,参与模拟,参与观察,参与评价,因此,在学生全程参与的过程中,教师也要进行引导,加强学生对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能够从模拟练习中得出结果或者是结论中领悟到事件道理。低年级小学生进入小学场景后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通过模拟的方式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情景模拟培养了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2. 事实情境回顾

情景回顾就是将班级学生间发生的问题尽可能全方位地呈现出来,由当事人共同演绎再现当时的情景,由此事件引发同学间的思考,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一是学生个体事件。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由主要参与者还原事实场景,再由全班同学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见解,总结后提升为班级公约。

第二是困扰班级管理的问题,通过班会尝试着用有趣、有效的情景再现,借助团队力量提出解决方案,及时地解决问题。比如针对班级岗位实施一段时间后,有的岗位负责人出现了懈怠的情况,同学们基于现实情境展开责任问题激烈的讨论和交流,群策群力提出解决方案,最后大家选择尝试方案。

全班同学经过协商决定开展了许多活动,不断创新。每一学年结束,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参与者,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从刚开始羞涩的小声的总结,支支吾吾的话语到后来精彩的绽放……孩子们从稚嫩走向成熟,也从一次次的参与、讨论、实践中,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学会了同伴互助。一次次活动也提高了孩子的自我效能感更加融入于这个集体,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都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

“同伴教育”是借助儿童趋众心理进行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班级管理之路任重而道远,实践出真知,这需要我们依靠智慧和经验不断去探索,去改进。

参考文献

[1]黄春霞.低年级班级自主管理模式对学生主体性发展影响的研究[J].小学科学(教师版),2015(02):117.

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中国特色及现实意义

胡圣知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重庆 永川 402160)

[摘要]陶行知作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他在杜威“实用教育”学说理论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和自身的教学实践创造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通过对“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及其理论的特点的分析,寻求“生活教育”理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陶行知;生活教育;中国特色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0.05.1083

陶行知是我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至今对我们的教育事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是对传统教育的指导思想、制度、内容、形式以至教育方法,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彻底的改造,实现为大众服务的教育转变,使教育转到“生活”的轨道上来。

一、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

(一)“生活教育”理论的最早根源

生活教育首先是瑞士教育学家裴斯泰洛奇提出的一种教育学说,他认为生活具有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和激发儿童的天赋能力,他反对单纯传授知识的学校做法,提倡知识学习和实践劳动相结合,要求学校教育努力做到知行和行的统一等,这些教育思想对我们有着极大的启发作用。

(二)“生活教育”理论的继承

在19世纪末,美国教育家杜威继承了这个学说,并将其发展为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之一的观点是教育即生活,也是个人经验的生长,教育和生活的过程是一致的,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学生在真实的情景下增长自己的经验,人是成长既不能脱离周遭环境,更不能脱离现实的生活,最终形成了“做中学”为特色的教学思想。

(三)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

1914年,陶行知留学美国并师承杜威,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裴斯泰洛奇的生活教育思想。在中西文化交叉渗透和融合的前提下,陶行知带着批判的态度,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分析和审视外国文化。他反对盲目模仿、抄袭别国的行为,主张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将本国自身的基本情况结合起来。陶行知经过长时间的教育工作实践与现实的体验与观察,把老师杜威的实用教育理论思想进行了一些变通,进而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一系列生活教育的主张,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

二、“生活教育”理论的中国特色

陶行知曾明确地提出:“只有透彻地研究自己需要的问题,才能确有把握地制订出一套真正适应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来。”^[1]他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背景以及帝国主义洋化教育、封建主义传统教育的状况下,构筑起了支撑其生活教育理论体系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三个部分。

(一)生活即教育

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怀特海曾写道“教育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五彩缤纷的生活。”^[2]陶行知也对此有过精辟的阐述: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可以说生活与教育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生活决定了教育,什么样的生活决定着什么样的教育;其次,教育对生活有着反作用,教育也会制约、改变生活。因此,陶行知的整个思想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是紧密结合社会实践的,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办教育,并以我国的生活实践为依归,这种教育思想观点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二)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即教育”思想在处理学校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具体化,

它意味着社会和学校相互融合、互相包含。社会生活有什么样的需求,学校就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在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的观念中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学校对社会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扩大,最终使得学校与社会真正融为一体。因而,陶行知结合其所处时代的中国实际社会生活,将其毕生致力于提高劳动大众生活的教育。

(三)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即教育”思想在教学方法问题上的具体化。它是陶行知在批判传统教育脱离生活实际的弊端上进行的教学改革中所提出来的,它的含义是:“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教与学都以作为中心”。其中他特别强调“做”的重要性,认为“行是知之始”,离开了实践就达不到任何教学目的了。因此,“生活教育”理论被陶行知视为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

三、“生活教育”理论对现代教育的意义

虽然当时的陶行知生活在极端贫困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但是他已经意识到教育现代化对富强中国的重要性。他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对于当前我们贯彻执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方针,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有效地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为建立新时期的人民教育制度指明正确方向

“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在旧中国的教育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它否定了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是建立新的人民教育制度的尝试。在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中,它的受众不仅只限学校和学生为对象,而是以整个中国社会、中国人民为对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教育的范围大大地得到发展。陶行知思想理论中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对新时期的教育制度依然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和引导作用。

(二)用创造的教育克服现代教育的弊端

用陶行知的话来说:“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首先得有勇敢的行动,才能获得知识,有知识才能创造。如果将“行动”看作是教育的开始,那么“创造”则意味着教育的完成,而创造的教育就是“以社会为学校”,学校和社会紧密联系,在行动和创造过程中努力克服当代教育中存在的教育脱离生活、学校脱离社会、理论脱离实际的诸多弊端,把教育办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繁荣昌盛的发展。

(三)基于国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

陶行知早年受王阳明的唯心主义教育思想中“知行合一”的影响,改名为“知行”,但在后来不断的教育实践中他认识到“行是知之始”,又改名为“行知”。为制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陶行知不仅对中国教育实况的调查研究工作投入大量的精力,还积极吸取国外的办学精华,这种求实精神和科学态度使“生活教育”理论紧密结合我国的社会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并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供新的经验和作出新贡献。

参考文献

[1]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

[2]王欣瑜.生活与教育的涵义及其辩证关系[D].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